

焦进文 杨富学 校注

甘肃人民出版社

元代西夏遺民文獻
「述善集」校注

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

焦进文 杨富学 校注

甘 肃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焦进文,杨富学
校注.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ISBN 7-226-02502-7

I. 元... II. ①焦...②杨... III. ①述善集—注释
②西夏(1038~1227)—史籍—注释 IV. K246.3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4737 号

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0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甘肃·定西神力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5 字数 310 千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26-02502-7 定价:30.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序 一

《述善集》是西夏后裔唐兀崇喜(杨崇喜)所编的文集,其成书经历了一段很长的时间过程。张以宁的《述善集叙》写于元至正十八年(1358),说明至正十八年《述善集》已经编成。危素于至正二十四年(1364)写的《赠武威处士杨象贤序》说:“兵乱以来,[杨象贤]哀所得晋绅先生文章,次辑之,曰述善之集。”证明在至正二十四年之前《述善集》确已成书,并表明《述善集》是集辑当时社会名流的文章而编成的。但流传至今的《述善集》中却收有明洪武五年(1372)三月陶凯所写《送杨公象贤归澶渊序》,说明杨象贤在书成之后,仍然继续收录文章,而王崇庆的《序杨氏遗集》又作于嘉靖六年(1572),说明在杨崇喜逝世之后,仍有人续编《述善集》。在《述善集》的最后还收有大明正德十六年(1529)辑入的《伯颜宗道传》和清顺治十六年(1629)的《尾题诗》。这说明《述善集》自1358年杨崇喜初编成书后,又经多次多人补编和续编,直到1629年,历经271年的时间,才完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述善集》。这271年,大概也是杨氏家族比较兴盛时期,因此才有可能多次补编、重编《述善集》。此后,《述善集》就成为杨氏(唐兀氏)家族的精神财富,在家族内部流传达600余年。现在杨氏家族愿将此“祖传秘宝”公之于世,成为中华民族的共有财富,真是可喜可贺。

《述善集》共分三卷:一、《善俗卷》;二、《育材卷》;三、《行实卷》。《善俗卷》以《龙祠乡社义约》为主体,配有序、赞、诗等文字。《龙祠乡社义约》是元朝保存下来的惟一完整的乡约,包括序、赞、诗在内,都是研究元代乡约民俗的第一手资料。《育材卷》以崇义书院为主体,计有《亦乐堂记》、《礼请师儒疏》、《有元澶渊官人慕创

建庙学记》、《锡号崇义书院中书礼部符文》、《中书礼部护持学校文榜》、《崇义书院记》及有关诗文。其中有申请私办孔子庙学的呈文及元中央政府批准建立崇义书院的原始文献。《行实卷》以记载唐兀氏家族前六世的历史及其善行善事为主体，主要文章有《祖宗行实碑铭》、《思本堂记》、《祖遗契券志》、《顺乐堂记》、《敬止斋记》、《知止斋记》、《孝感序》、《为善最乐》、《观德会》等，并收录有铭、诗、箴等赞颂、劝戒等文字，是研究西夏后裔濮阳唐兀氏一支随元军征战及迁濮阳后汉化、儒化的原始记录，弥足珍贵。

《述善集》的史料价值绝对不限于以上所介绍的三个方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述善集》对于研究元代和明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民俗等都有重要价值。《述善集》中保存有西夏一支遗民唐兀氏和突厥族一支遗民哈刺鲁氏的汉化历史的完整资料，对于研究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融合问题，对于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典型意义。已故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其所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有句名言：“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意思是说民族的融合，首先是文化的融合，是以文化融合为先导，然后才是血统的融合。迁居濮阳的西夏唐兀氏和突厥族中的哈刺鲁氏之融入汉族，走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他们首先是吸收汉族文化，即学习儒家文化，然后才是与汉人通婚。《述善集》的编辑和流传，就足以显示它是民族融合的范例。

由于《述善集》长时间仅在唐兀氏家族中内部流传，因此所收录的诗、箴、铭、文，包括元明时期名人的诗文，也不为外人所知，甚至名人自己的文集中也没有收录，赖《述善集》才得以保存下来，对于研究元明时期的文学也是极其珍贵的资料。

《述善集》的文字一般说并不艰涩难懂，但由于世代传抄，乖舛错漏现象较为严重，文中经常涉及一些少数民族的姓名和元代的职官、地理，在一些诗文中还引用历史典故，如不加标点和注释，对一般读者来说，也可能是很大的障碍。焦进文同志和杨富学先生

合作标点、注释《述善集》，会帮助读者解决阅读《述善集》时的障碍。

焦进文同志长期在濮阳县担任文化、宣传领导工作，与杨氏家族多有接触，比较了解西夏后裔唐兀氏的历史和现状。杨富学先生是西北民族史专家，对西夏和元朝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们两位的合作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他们不仅对文献进行了标点，而且查阅了大量的古代典籍，出注近千条，工作浩繁，颇为不易，非身历其事，就很难想象其中的困难。我深为这种认真负责的学风所感佩。我有幸拜读了他们的校释原稿，虽然还不能说达到完美无缺的地步，但其标点、注释基本是准确的，毫无疑问，对阅读《述善集》会带来很大的方便。

由濮阳杨氏（唐兀氏）家族珍藏六百余年的《述善集》即将公开与读者见面了，这对研究元明史、少数民族史、民俗学及其他方面的读者来说，算得上是一件大好事。由于我事先阅读过《述善集》校释原稿，所以本书作者向我索序，虽自知不敏，而盛情难却，于是随便谈几点感想，权作小序，并以此对《述善集》公开出版表示祝贺。

河南大学教授 朱绍侯

2001年1月15日于雏飞书屋

序 二

80年代初，河南省濮阳县柳屯镇杨什八郎村西夏遗民唐兀氏后裔杨姓族人继将祖上元代《唐兀公碑》公诸于世后，又献出了杨姓族人珍藏六百年的祖遗藏书《述善集》传抄本。文集中也收录唐兀公碑铭。与此同时，由原族长保管的《杨氏宗谱》也公开面世，使现今居住在濮阳县柳屯镇杨什八郎村为中心的西夏遗民唐兀氏杨姓一族的历史渊源与生存变迁更加清晰起来。《述善集》面世以来，已有专家学者撰文介绍，1997年4月24日和1999年4月24日，濮阳县委和县政府曾先后两次举行地方和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就《述善集》和《杨氏宗谱》的内容、学术价值进行了专题讨论。1999年的学术讨论会上，与会成员就编辑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和出版《述善集研究》（校注本）达成共识。会上推举濮阳县宣传部焦进文和著名西北古代文史学者杨富学二人担负文集的校注研究工作。时经寒暑二载，稿成即将付梓之时，命我作序。我深知此项工作的繁琐与辛苦，拜读一遍自觉无可置喙，容留方家的评论。借此机会谈点与此相关的题外话，以引起同好的关注。

我从事西夏文史研究工作多年，近年来因关注西夏遗民的研究，因而也注意到元代以后西夏后裔的宗谱。以我在《元代唐兀氏与西夏遗民》一文中提到的有安徽余姓宗谱2种，四川余姓宗谱3种，云南余姓宗谱12种，以及河南濮阳杨姓宗谱与西安新发现之《西夏皇族世谱》10种。近据2000年第4期《宁夏社会科学》发表的《西夏宰相斡道冲及其子孙的足迹》，作者根据《朵儿赤宗谱》介绍西夏崇宗、仁宗时期的著名学者、宰相斡道冲及其后世子孙斡扎箴、朵儿赤、朵儿仁通、朵儿伦（斡玉伦图）等后裔繁衍至今已24代，

主要散居在云南昆明、昭通等地的朵氏家族。

关于濮阳《杨氏宗谱》，据罗矛昆、许生根《河南省濮阳地区西夏遗民调查》介绍，今保存在濮阳杨什八郎村原族长杨兴雷家中的《杨氏宗谱》总谱，书于布帛之上，长4.18米，宽1.95米。有明嘉靖十四年（1535）和隆庆元年（1567）的序录。据悉元代原有刻版，今已不存。今杨氏家族保存的是清代重修的线装分谱。因我未对濮阳杨氏宗谱作过调查，据濮阳县提供给我的一份复印资料中有清乾隆三年（1738）的《杨氏家谱序》，道光二十年（1840）《杨氏重修家谱序》、《杨氏重修家谱文》、《杨氏重修思本堂记》；民国九年（1920）的《唐兀杨氏重序家谱文》、《续修杨氏族谱序》、《唐兀杨氏续修家乘序》、《读述善集诗十首》等诗文。

以上我谈到的宗谱，基本上是近十余年来新发现的，绝大部分尚未著录。如据我查考，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由国家档案局、南开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部门，自1980年开始共同调查收录，1997年9月出版，收录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各大学和公共图书馆，以及台、港、澳和日本、美国等地的家谱目录，共14719条。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家谱调查与收录，也是迄今收集家谱数量最多的一部大型谱牒文献。但是，我以上列举的西夏遗民唐兀世谱则因各方面的原因基本上没有收入，可见中国私家谱谍蕴藏之富，有待大力发掘。另一方面，我试对《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余姓宗谱的分布统计，计有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台湾以及不明地区者共101种。现今所见的《余氏宗谱》其先祖都可追溯到元代余闾（1305～1358年）。据《元史·余闾传》：“余闾，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世家河西武威。父沙刺藏卜，官庐州，遂为庐州人。”所以安徽多余氏后裔，元、明时又分迁各地。安徽合肥《余氏家谱》、《洪涛山余氏宗谱》可以查到余闾后人迁往河北、河南、陕西、江苏、江西等省的线索。

清代光緒十一年(1885)《續修廬州府志》、宣統三年(1911)重修《山東通志》都有余闕后人在山東做官落籍的記載。又《目錄》記載四川合江縣焦灘鄉老瀘村柿子林余氏后人保存的《余氏族譜》，应当和我在文中列舉的同縣同鄉門角村余錫齡所藏《余氏族譜》同宗。據此可以推斷，《目錄》中已收錄的百種余氏族譜至少有半數是余闕后人之支脈宗譜。如此說成立，《目錄》所提供我們尋找西夏唐兀氏后裔的線索是極其豐富的。

這里順便談及《西夏李氏世譜》問題。90年代中，“西夏皇族家譜面世”的消息報道引起西夏史學者的廣泛關注。其后，譜主李培業先生發表《西夏皇族后裔考》(刊《西北大學學報》1995年第3期)一文，拜讀后，我和同仁就西夏末帝是否存在嫡裔問題提出質疑。1998年8月，經李培業先生整理其父李鴻儀先生編纂的《西夏李氏世譜》，由遼寧民族出版社出版。2000年冬，蒙李培業先生寄贈一部，書中讀到了他對我質疑的駁正，同時也可看到他對昔日發表過的文章的修正，如原文稱西夏末帝李睨子李賞哥曾入元為“元岐王府官”，這里改為“元祁王府官”；並稱末帝李睨子“賞哥非睨所親生，而為其侄者，大有可能”。如此一改則又另當他論。《世譜》洋洋80萬言，內容豐富，資料珍貴，認真拜讀與消化當容時日。我贊賞李培業先生對學問的執著追求精神，如他所希望：“在《西夏李氏世譜》出版后，更多的西夏史學者，不抱任何偏見，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共同進行研究。”西夏是一個曾經被歷史遺忘的王朝，西夏之亡，西夏境內各族人民就像斷了線的風箏飄向四方，逐漸融入漢民族和其它少數民族的洪流之中。我們有幸借助於保存下來的家族史書“宗譜”，能在紛繁的民族與家族播遷中理出頭緒來。現在我國正處於“盛世修史”的歷史機遇中，優良的“譜牒”傳統文化，正擺脫主觀的神秘性與客觀上的極“左”思潮，成為全民族的文化遺產。“譜牒學”已被國家列入“國學”研究的學科之一。“宗譜”的發掘與

整理、研究既具有学术与文化价值，又发挥其当前“寻根”热的作用。

白 滨

2000年3月25日

北京劲松之吸墨庐

序 三

濮阳县元代党项族唐兀崇喜历时 30 余年辑录而成的家族藏书《述善集》，收录诗文 70 余篇，共约 4 万余言，分《善俗》、《育材》、《行实》三卷。其中，他自著诗文 8 篇，其余大多为称著于史的文化名人所撰。文笔精美，叙事生动，内容丰富，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俗、社会生态、政治制度、伦理道德、阶级矛盾及元末农民起义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刻的反映，是宋末、元、明初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其中，不少诗文充满了怀念桑梓、忧国忧民的爱国激情，发人深思，促人奋进，实乃提高民族素质、增进民族团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这也是我们出版《述善集》校注和《述善集》专题研究论文集的主要原因和初衷。

学者们在研读《述善集》的过程中，不难发现，现存的两个传抄本互有舛误，多有鲁鱼亥豕之疑，加之文中用典繁多，古代民族名目繁杂，涉及地域广博，给阅读增添了诸多不便，确有点注和论证的必要。濮阳县委宣传部刘善章及有关同志和敦煌研究院著名学者杨富学先生，携手合作，承担了校正和点注重任。他们通过数年的不懈努力，筚路蓝缕，终于整理出一部可信从的本子。除了对文献本身进行精心的校勘外，他们还特别注意对典故、名物、人事、典章制度的注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注释并不局限于对一事一物的简单说明，而是旁征博引，广泛吸纳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推陈出新，有些注释本身就是一篇小论文，有些则似研究综述，对许多问题的阐释都颇有新意和启发性，实是一部难得的研究元代西夏遗民的有价值的著作。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朱绍侯先生、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著名西夏史专家白滨先生，始终关心着该书

的校点和出版工作,并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宝贵意见。他们心向学术,为学术负责的精神,颇值得我们效法!

我们盼望已久的《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述善集〉研究论集》不久都将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问世了。这标志着对《述善集》的研究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成为21世纪研究《述善集》及元代西夏遗民的良好开端。但《述善集》的价值,决非论及所止,仍需要继续探索研究,希望全国学术界有关专家学者,继续关注、关心这项工作,改革奋进中的濮阳县人民,真诚、热切地欢迎诸位的光临。聊以为序。

何广博

公元2001年元月18日

前 言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古代文化的党项人就是曾为古代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民族之一。

党项自称“弥”或“弥药”，是古代羌族的一支，本为一小部族，几经迁徙进入西北地区，于陕北建立了割据政权。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归附于唐朝的西夏残部内迁到灵（今宁夏灵武县）、庆（今甘肃庆阳县）、银（今陕西米脂县）、夏（今陕西靖边县）等州境内。唐末，以镇压黄巢起义之功，党项首领拓跋思恭被授予夏州定难军节度使职，赐姓李，统辖着今陕北无定河流域的榆林地区。从唐末到五代，藩镇割据，中原板荡，夏州西夏政权偏居一隅，乘机壮大自己的实力，成为与中原对峙的割据政权。在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祖孙三代的统治之下，夏州西夏政权东抗宋朝，保住原有领地；西攻回鹘和吐蕃，将势力推进到河西走廊，控制了“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

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元昊经过改姓建制、创立文字、秃发易服等一系列的准备之后，正式建立大夏国，建都兴庆府（今银川市）。统治区域相当广大，奄有今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 and 青海、内蒙古的部分地区。境内生活着党项、汉、吐蕃、契丹、女真、回鹘、鞑靼等多种民族，党项人在政治和文化上都居于主导地位。元昊称帝建国前后，在汉儒张元、吴昊等人影响下，立官制，定兵制，制礼义，造文字，建蕃学，基本上承袭了唐宋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制度。元昊建国标志着党项社会实

现了封建化。西夏王国从景宗元昊到末主昀共传 10 帝，历时 190 年。先后与宋、辽、金等政权并存成犄角之势，又与回鹘、吐蕃等势力发生摩擦，历经战和交替、变乱兴衰，终于在 1227 年被蒙古汗国所灭。西夏灭亡后，境内的西夏民族散居各地。其中的一支后来迁居到了河南的濮阳。

元人从大一统的史观出发纂修辽、宋、金三史，将三个朝代置于平等的地位，这是颇具历史眼光的。但独不为西夏写出一部分量同样足观的纪传体专史，只在三史的外国传中以少许篇幅专载西夏史事：116 卷的《辽史》仅在《外国二记·西夏》中述及西夏历史，135 卷的《金史》仅有《西夏传》一卷，《宋史》以卷帙浩繁著称，全书达 496 卷，其《夏国传》也只有上下两卷。以此之故，西夏史实与典章制度遂致湮灭亡佚，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至于清人吴广成撰《西夏书事》、张鉴撰《西夏纪事本末》、周春撰《西夏书》、佚名氏撰《西夏志略》及民国戴锡章撰《西夏纪》等，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不能作为史料来使用的。所以，发掘、研究各种新涌现出来的史料，成为西夏研究中至为关键的工作。1985 年河南濮阳发现的《述善集》手抄本，就是新发现的研究元代西夏遗民历史的极具重要价值的新资料。

《述善集》约有 40000 字左右，其最初编成的年代在《述善集》中未见记载，但张以宁撰《〈述善集〉叙》的年代是“至正十又八年的嘉平月”，说明唐兀崇喜（又称杨崇喜）至迟于至正十八年（1358）已编成此书，后来又补入了唐兀崇喜等人于元末明初新撰写的一些诗文。其中属于明初的作品有洪武五年（1372）唐兀崇喜撰写的《劝善直述》和陶凯撰写的《送杨公象贤归澧渊序》，就其内容而言，反映的仍为元代西夏遗民的事迹，故本书的取名仅标明元代。

《述善集》现存手抄本 2 件，均藏于杨十八郎村杨存藻家，保存完好，全书共分《善俗》、《育材》和《行实》三卷，内收

记、序、碑铭、诗赋、题赞、杂著等共 75 篇，保存的元代西夏遗民资料是相当丰富、异常珍贵的。综观全书，可以将其史料价值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面记录了西夏遗民徙居河南濮阳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史籍中全无记载，幸赖《述善集》抄本的发现，才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找到了依据。据危素所撰《赠武威处士杨象贤序》一文可知，河南濮阳的西夏遗民应来自河西的凉州（今甘肃武威市）。

从《述善集》的记载可以看出，濮阳西夏遗民的始祖为唐兀台。他曾“扈从〔蒙古〕皇嗣昆弟南征。收金破宋，不避艰险，宣力国家，尝为弹压”。^①于 1259 年病歿于军中。其足迹其实并未涉及河南。碑载唐兀台去世时，其子闰马（1248～1328）方 10 岁。闰马参加过元军于 1268～1273 年攻取襄阳、樊城的战役。在元灭宋后，始定居于河南濮阳地区。

二、具体地记录了西夏遗民汉化的进程。濮阳西夏遗民的汉化，在《述善集》中反映甚多。其姓名的汉化最为明显。从始祖唐兀台到三世达海（1280～1344），专用赐姓唐兀。四世崇喜则唐兀与杨氏并用，但公开场合多用赐姓，私下则多用杨姓。从五世以后迄今之第二十八世，独用杨姓，再未发现以唐兀为姓氏者。崇喜在太学读过书，受过汉文化的熏陶，便取字象贤。流风所及，他的 13 个兄弟也“因象贤之字类推以代其名”，分别取字为思贤、师贤、齐贤、敬贤、继贤、好贤、尚贤、绍贤、居贤、希贤、志贤、惟贤、世贤。^②与汉人的名字已完全相同。

其生活习俗的汉化也在《述善集》中多有记载。闰马在迁居濮阳之初，即“卜茔于本宅之西北堤南道北爽垆之地，亲茔冢圻，栽植柏杨，乃迁其祖考妣而葬焉”。^③三世达海将坟地由一亩扩为 10 亩，再扩为 200 余亩，收入专供祭祀之用。四世崇喜放弃功名，守丧葬母，并为其先人立碑刊石。这些举动和汉族士绅已经毫无二致了。

三、全面记录了濮阳西夏遗民创建崇义书院的过程。濮阳西夏遗民非常重视儒学。自闾马移居濮阳开始，子孙三代相继筹建义学。至正十三年（1353）义学终于落成，并置学田五百余亩，聘请唐兀伯都任教，学生逾 50 人。闾马“尝言：‘宁得子孙贤，莫求家道富’。常厚礼学师以教子孙，乡人家贫好学者，悉为代其束修礼”^④。杨崇喜于至正九年（1349）鸠工庀匠，建造大成至圣文宣王之殿。红巾军农民起义爆发后，杨崇喜“献粟五百石，草一万束以助殄寇之资，不求名爵，求赐崇义书院之号”^⑤。得到了中书礼部的行文嘉奖。

对杨氏家族创办崇义书院之举，《述善集》多有记载。张以宁撰《濮阳县孝义乡重建书院疏》、潘迪撰《有元澶渊官人寨创建庙学记》、张以宁撰《崇义书院记》及程徐撰《崇义书院田记》、《锡号崇义书院中书礼部符文》、《中书礼部护持学校文榜》及潘迪撰《礼请师儒疏》（二篇）等文，把唐兀氏子孙三代建立书院的经过，包括筹资建房，学堂面积，学田亩数，申报呈文，赐号崇义书院的批文，礼请教师等一系列情况都记录在案，是我们迄今所见最完整也最原始的元代书院记录，是研究元代教育，尤其是西夏遗民教育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四、多方面记录了濮阳西夏遗民与汉及其它民族通婚融合的情况。据《述善集》卷 3 所收潘迪《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并序》及《杨氏家谱》载，一世唐兀台之妻为九姐，族属不详，二世闾马之妻为哈刺鲁氏，三世弟兄 5 人，其中 4 人妻为汉族，仅买儿一人妻乃蛮氏。四世昆仲 14 人，其中卜兰台娶旭申氏，换住娶哈刺鲁氏，不老娶怯烈氏，广儿娶旭申氏，拜住亦娶旭申氏，余九人之妻均为汉族。五世弟兄更多，仅理安娶哈刺鲁氏，童儿娶乃蛮氏。随着这支西夏遗民汉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自第六世以后，其娶妻已全部为汉族。其汉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了。

五、保存了大量元末（少数属明初）的佚诗、佚文。《述善集》共收录各种体裁的文章与诗赋 75 篇。其中，文章 41 篇，包括序、记、赞、说、碑铭、箴、志、符文、榜文、疏、传等，诗、赋有 34 篇。涉及作者 41 人。其中，潘迪 14 篇，唐兀崇喜 8 篇，张以宁 7 篇，程徐 5 篇，王崇庆、张翥、张楨、睢佳各 2 篇，其余 32 人各一篇。在 41 人中，身世清楚并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社会声望者大致有 16 人。其中，张翥、张楨、伯颜宗道在《元史》中都有专传，张以宁、程徐、王崇庆、张孟兼、陶凯、张筹、危素、曾鲁、魏观在《明史》中也各有传，其他如潘迪、项驾、唐兀崇喜、曾坚，在地方史志中也见于记载，说明他们都是当时显赫一时的人物。其中，张以宁著有《翠屏集》，张翥有《蜕庵词》、《蜕岩词》，张孟兼有《白石山房遗稿》，程徐有《积斋集》，王崇庆有《端溪文集》，危素有《危太朴集》，魏观有《蒲山集》、《蒲山牧唱》等传世。值得注意的是，《述善集》所收之文在各人文集中均未见收录。1999～2000 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推出的《全元文》（20 册）一书，收录除诗、词、曲、谣谚、小说以外的一切散文、骈文、辞赋等共计 30000 篇左右，涉及作者约在 3000 人以上，搜求可谓宏富，惜《述善集》所见者却未有一人一篇入录。《述善集》的再度问世，使这些元明文人的作品得以再行于世。《述善集》中所收《龙祠乡社义约》是迄今所见我国最为古老的少数民族乡约，反映了理学对西夏遗民的深刻影响；唐兀崇喜撰写的《祖遗契券志》是罕见的元代整理家藏契约档案的珍贵记录；^⑥《伯颜宗道传》更是详尽记录了元代哈刺鲁人伯颜宗道的生平，同时也反映了元末农民起义在河南濮阳一带的活动情况。^⑦

总之，《述善集》对研究元代西夏遗民及其他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